

山西天主教教區修女會研究考察

張闊

[摘要]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天主教經歷了四十年的發展。伴隨這一歷程，現今出現面臨聖召匱乏無力接續的問題。文中考察具有傳統意義的山西天主教的教區修女，通過對修女的年齡、教育和城鄉背景的考察，呈現當下修女會的現狀。聖召匱乏已成為事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莫過於城市聖召的不足。對於山西教區修女會的考察，也折射整個國內教區修女會的狀況，呈現衰退、無以為繼的跡象。三十年後，國內一半的教區修女會將要消失。那麼，教區修女會的出路在哪裡？

Abstract: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in 1979,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Alongside this process, the problem of a shortage of vocations has emerg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atholic sisters in the diocese of Shanxi which is of traditional significan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gregations of women religious is reflected 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ir age, education, and rural-urban background. The lack of vocations has become a realit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is the lack of religious vocations in the urban area.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gregations of women religious in the Diocese of Shanxi

reflect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diocesan women religious in the whole country, showing signs of decline and unsustainability. In thirty years' time, half of the congregations of the diocesan women religious in China will disappear. The author raises the question: Where is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diocesan religious sisters?

引言

隨著中國教會復興與發展的四十年，亦相對伴隨著一個凸顯的問題，即聖召短缺。近年，聖召短缺話題為國內教會而言常被提及，緣由便是看到國內諸多修道院（神學院）的凋零或倒閉，往日修院人聲鼎沸欣欣向榮的氛圍一去不復返，「各地修院修生的總人數，已從2002年高峰期的2,470人，劇減至2018年的稍多於485人」¹為女修會亦然，許多修會面臨聖召難以為繼的局面，「在聖召稀少的情況下，現時教區中國修女會成員人數在40人以下者佔多」²

縱觀中國天主教，華北區域的天主教發展態勢良好。山西教省地處華北，與河北、陝西、內蒙相鄰，被認為是教友多、信仰傳統的地方，修女會自然相對被認定為發展逐步向好的趨勢，且聖召充盈，無需擔憂聖召之事。事實上卻不然，山西教區修女會面臨斷代的危機，聖召的匱乏可能令大眾譁然。

選擇以山西教省的教區修女會為考察對象，在於山西教省被認定為發展良好的教會，具有典範意義。揭示山西教區修女會的現況，亦可以反映其他教省教區修女會的現況，具有窺一斑而見全貌的功用。故此，本文的焦點落於教區修會修女的年齡、城鄉背景和教育程度方面，以期展現教區修女會的基本概況與發展前景。

1 林瑞琪，〈中國目前的「一代人教會」引發思考〉，《鼎》第39卷，總第195期（2019年）。

2 劉淑珍，〈中國度獻身生活者「身份的認同」——21世紀20年代的新挑戰〉，《鼎》第39卷，總第195期（2019年）。

一 研究條件

改革開放後，各地教區一片空白，教區司鐸缺乏、主教空缺是常見之事。主教是教區的核心角色，後期各地教區主教空缺這一問題陸續得以解決，教會的日常運作得以恢復和完善。故此，教區修女會的成立一方面由過去老修女的努力逐步恢復，另一方面是在選出主教之後的事，由教區主教所成立。很多國內教區修女會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方得以成立，這段時間亦是本文所探討的修會成立的時間。

本文對修女會的研究，只涉及山西教省。諸多緣由，山西教會被認為是國內教會發展良好、教友人數較多、聖召搖籃的地方，具有典範的地區教會。之所以被如此看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聖召共用，為全國各地輸送聖召人才，為國內教會之振興貢獻一己之力。山西教省有八個教區，各個教區皆有教區性女修會，³從地理位置觀察，教區大多集中於山西中部和南部，亦說明中部和南部教區的運作情況，而聖召亦主要來源於山西中部和南部。

因考量不同因素，本文側重於小型教區性修會，故羅列以下研究條件：首先，本文只涉及教區性修會，故對國際性修會存而不論，個中緣由不做討論。其次，對於省會都市的教區修女會不做探討。因城市化原因，很多願意修道的女性有意願加入省會大都市的修會，聖召

3 傳統上忻州和晉城不是教區，歸屬太原和長治教區，但忻州有若干修女，本文不做探討。

來源受城市化的影響而源自不同地區。故此，對省會都市外的其他教區修會的探討，方可呈現二三線城市教區修會的真實情形。第三，本文只探討人數介於二十位以內的修會，故涉及三個教區修會，本文以 D、S 和 Y 作為三個修會的標記。

本文對三個修會的研究問題涉及到入會年齡和入會年份，以此可知修會人數的發展興盛年代，亦會從入會年份得知修會是否處於斷層危機，有的學者用「一代人教會」來形容。其次是針對戶籍，源於農村或城市，以此印證中國天主教的群體方向，亦可以藉此反省天主教城市化的影響力。第三涉及社會教育背景，通過橫向的社會教育對比，呈現一個時代的縮影，並藉修女的教會神學教育，以此衡量神學的普及化程度。

二 聖召井噴現象？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政經皆有長足的發展，天主教亦在此開放的春風中逐步恢復信仰生活。老一輩神職、修女急於培育下一代聖召，開辦修道院，恢復或創建修女會，一時之間，各地聖召如雨後春筍，一些學者的研究文本認為聖召呈現井噴現象，但對於本文所研究的三個修會個案是否支持這一基調？

探討修女的入會年份，可確知聖召興盛的時代年段。D 修女會的修女大都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入會，83% 的修女源於這個時期，其餘源自千禧年後，最後一位是 2005 年。S 修女會全部源自千禧年後，最後一位是

2006年。Y修女會百分百源自千禧年後，最後一位是2008年。三個修女會，最早一位是1998年，最後一位是2008年，即在此十年間，主要是修女聖召的時代年段。

單以入會年份來論，則會忽略其中的一個問題，即等待時期。可能有更早願意修道的女性，但形單影隻，無法組建修會，故等到幾位願意修道的女性出現，方可組成一個小團體。如D修女會數據所示，若干女性於1998年一道加入修會；S修女會42%的修女於2000年一同加入修會；Y修女會25%的修女於2000年一起入會。三個修女會皆呈現此情形，即等待期，隨後與志同道合的女性一同組建修會。

修士與修女不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便已經有很多修士進入修道院或神哲學院，而修女組建修會幾乎比修士修道晚了十年左右的時間。一方面由於當時的教會集中力量辦修道院，需要年輕一代的神職，故而忽略了修女會的成立；另一方面在於修女會的根基與主教是否空缺有關係，這三個教區修女會皆在有了主教之後成立，兩位主教的祝聖時間為九十年代初，一位在九十年代末。

過往對於國內聖召數量，匱乏或井噴現象，大多持樂觀態度，即井噴，但從以上文中所示，皆為人數二十位以內的教區修女會而言，更何況是被認為教友人數居多的山西教省而言，聖召僅僅夠維持與延續，至少在此三個地方，對聖召井噴現象呈現質疑。

三 聖召農村化現象

1958 年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管理登記條例》頒佈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嚴格區分城鄉戶口的制度。此條例標誌著城鄉身份制度分離的「二元結構」體制的形成。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初，城鎮戶籍人口大約佔 20%，農村戶籍人口大約佔 80%。⁴

聖召來源是否受城鄉人口結構比例影響？上世紀八十年代，城鄉人口比例以二八為參照；到了 2000 年之際，城鄉人口比例為三七。根據調查所示，D 修女會百分百的來自農村區域；S 修女會 86% 來自農村；Y 修女會百分百源自農村。三個修女會成立於兩千年前後，從三個修女會的比例來看，聖召大都來自農村，與城鄉人口的二八或三七比例略有差距。故此可看出，源自農村的聖召比較偏重，而城市聖召較弱。

信徒城鄉人數比例亦是指向標。學者們對中國基督信仰的信徒人數估量，因方法不同而導致數據差距巨大，對於天主教徒人數的估算亦有相當大的數據差距。但關於中國教會信徒在城鄉的分佈比例，「對於農村信徒所佔的比例幾近一致，均認為農村信徒佔到總信徒的 70% 到 80%。」⁵ 教友城鄉比例幾乎亦可以二八比例作為參照，既然農村教友佔八成比例，說明至少八成的聖召源自農村，此亦符合教友的城鄉所佔比例。但從上述修女

4 城鎮人口佔總人口比重：1980年，19.39%；2000年，36.22%；2019年，60.60%。

5 許淳熙，〈城市化進程中基督宗教信眾結構與活動方式的變化探析〉，《信德學刊》，第6期（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2013），頁14。

會聖召來源的數據來看，聖召來源明顯偏重於農村，而城市聖召相當乏力。上述聖召來源的事實指出，中國的城市教會發展不足，至少是聖召匱乏的一方面原因。

中國社會的城鎮化發展方向已成定局，現今人口的城鎮化率達到 60%。中國教會過往一直注重農村教會的發展，而城市牧靈福傳的力度單薄而乏力，城市堂區的缺乏便是例證。故此，移居城市而導致農村社會的崩壞，意味著教會的農村化牧靈被迫轉向，聖召的匱乏意味著一方面失去了農村的聖召來源，另一方面亦沒有打開城市的牧靈格局，城市的青年男女對聖召缺乏興趣。中國教會在聖召來源方面陷入了困境。

四 修女教育背景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高校的錄取率非常低。即使是 2000 年，高校報考人數 375 萬，錄取率僅為 58.9%。但從 1981 年到 1997 年，每年的出生人口都維持在兩千萬以上，由高校報考人數和錄取率可知，絕大多數學生在小學、初高中學期間輟學。因為八十年代的出生人口，以 2000 年為時間節點，達到高考年齡，但出生人口僅有 10% 可以入讀高校。

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修女的教育程度因時代而不同。一位學者考察陝西的修女會，「八十年代初期加入修會的以小學或初中程度佔大多數，九十年代以高中畢業明顯增加。」⁶ 另一位對上海修女會研究的學者指出，

6 李雯文，〈試論中國當代天主教中的性別——從農村天主教修女的一個個案出發〉，《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八）》（香港，2003），頁365。

「上海聖母獻堂會，截至 2004 年 10 月，修女院的學生中，初中程度的學生比例為 54.5%，仍佔全體學生人數的一半以上。」⁷乍眼一看，修女的社會教育程度與我們所認知或想像略有差距，但應考察時代背景，應做橫向的社會對比，而非縱向對比。

此處想要表達，以 2000 年為時間節點，出生人口 10% 的大學入讀率，指出修女的教育背景與社會基本相似。以入讀高校為基準，山西 D 修女會，大專佔 16%；S 修女會，大專佔 14%；Y 修女會，大專佔 18%。亦有小學教育程度，乃個別案例，暫且不論，其餘大都是高中、中專和初中的教育背景。修女所受教育比例顯示，與社會大環境背景有關。況且，本文沒有提及修女的高比例社會進修培育，以及修女日後的神學教育背景，無疑對自身的信仰和人文素養有所助益。

神學教育為做神職的修士而言，必須經歷六年的神哲學培育，但為修女而言，似乎可有可無。如若缺乏神學培育，修女在牧靈與福傳的過程中會感覺到艱辛與乏力，故神學培育對國內的修女而言不可缺少。

國內修女的神學培育起步較晚，分進修和完整神學培育兩類。D 修女會，67% 的修女在神學院接受 2 年的神學教育；S 修女會，86% 的修女在神學院接受 2-3 年的神學教育；Y 修女會，37% 的修女接受完整的神學教育（包括正在修院讀書的修女），12% 接受 2 年的神學進修，6% 的修女有留學經歷，並獲得碩士學位。

7 周輝，〈天主教女修會對中國社會的意義——從上海教區聖母獻堂會的歷史和現狀談起〉，《天主教研究論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頁424。

基於國內的現實考量，修女大部分服務於教區或堂區，以牧靈福傳為主。故修女的培育過程中，神學教育不應處於可有可無的狀態，而是必經階段，既可深化信仰，又可在牧靈福傳中學有所用。

五 聖召銳減或契機？

聖召匱乏似乎是全球各地天主教的議題，中國教會經歷了四十年發展，如今也面臨此問題。如何解決聖召來源的問題，國內教會顯得手足無措，陷於困境。

「一代人教會」一語可以清楚表達聖召匱乏的困境。修女的年齡段呈現出斷代的危機，「60後之前的修女是絕無僅有，而60後至80後的成員高據整體人數的九成半，而90後（以目前看即20歲至30歲之間）的成員只有百份之5。這也同樣擺脫不了「一代人教會」的局面。」⁸時代性大環境已經造成了中老年修女的斷代（缺乏60歲以上的修女），現今90後的比例如此小，意味著不久的將來將會造成新的斷代危機。

平均年齡是團體活力的重要參照。以今年2020年為準，D修會的平均年齡為45.5歲，年齡跨度從38-49歲之間。S修會的平均年齡為48.7歲，年齡跨度從41-57歲之間。Y修會的平均年齡為42.4歲，年齡跨度從33-60歲之間。雖然平均年齡呈現出修女的最佳狀態，正值年富力強的階段，但後續力量薄弱。三個修會，最年輕的一位是33歲，沒有一位是90後。

8 參林瑞琪，〈中國目前的「一代人教會」引發思考〉，《鼎》第39卷，總第195期（2019年）。

後續力量薄弱亦反映在多年未有新生力量。以入會年份為主，截止 2020 年，D 修女會最後一位於 2005 年入會，連續 15 年已經沒有新生力量的加入。S 修女會最後一位是 2006 年入會，連續 14 年呈現空缺狀態。Y 修女會最後一位是 2008 年，連續 12 年缺乏有意修道的新人。信仰需要代際傳承，聖召一樣，未來十年，假如沒有接二連三的新生力量的匯入，意味著這一教區修女會的終止。

聖召銳減雖是危機，亦是契機。危機是一些教區修女會未來將要消失是可見之事；契機是出於大公精神，缺乏培育的教區修女會可將新生代聖召送往其他有能力培育的修會，否則，既培育失敗，又會丟失聖召。再則，可邀請國際修會協助培育新生代聖召。因國際修會歷經歲月磨合，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一方面負責培育，另一方面亦可引入其修會的成功經驗。或者，可組建跨教區或跨教省的修女會，集合優秀的培育人員，建構良好的初學培育地方。

結論

近年，隨著中國教會的興旺之際，引發社會對教會的現象級研究。不論是神哲學、教史及社會學層面，皆有大量的作品或系列期刊專研基督信仰。此種發酵引發「漢語神學」、「基督徒學人」、「文化基督徒」⁹ 辭彙的出現，呈現出信仰躍躍欲試進入公眾領域的姿態。

9 筆者喜歡用「文化傳教士」一詞，無論是否是基督徒，研究基督信仰，發表於期刊，在社會高等學府中具有發酵作用。

神職和修女是一獨特的群體，社會學者側重以人類學的角度闡釋這個群體的特性，本文則聚焦於教區修女的時代性。興起於九十年代的修女群體，以其獨特的角色為信仰作證，現正值大好年華，但新生代卻無人接續，聖召匱乏、聖召斷代的危機明顯存在隱憂。

修女的身份夾雜於神職與平信徒之間，雖是度奉獻生活者，但教友對待修女與神職則有明顯的不同，令諸多人士唏噓不已。修女默默無聞奉獻自我，生活、醫療、養老得不到保障的支撐，經濟難以自立。凡此種種，亦是缺乏聖召的原因。

中國教會的聖召斷代已經是明顯的問題，當今卻不同與以往。過往老一代由於時代問題，而產生近半個世紀斷代差距；如今卻由於多樣原因而產生聖召危機，整體呈現衰退現象。換言之，三十年後，教區修女會是否坐等消失？中國教會應深思反省，男女青年為何不願踏上聖召之路？